

50年代学习苏军的争论与结局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研究员 刘志青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掀起学习苏联军队的活动,对于加强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即“三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全军甚至全党,自始至终对这一活动存在不同的认识,并且引起公开争论。由于当时受中国共产党极“左”错误路线的影响,人民解放军没有正确地认识这些争论,没有认真地总结学习苏军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缺乏正确引导,而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反复走极端,交替展开对所谓的保守主义或所谓的教条主义进行批判。最终,学习苏军的活动被终止,与学习苏军有关的人受到批判、处分、降职等处理,使刚刚起步的“三化建设”遭受到毁灭性的摧残。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人民解放军重提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今天,认真反思这一段非同平常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或囿于政治因素,或囿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较少关注。本文窃以一家之言,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学习苏军的迫切性

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游击状态和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日益摆在自己的面前。过去,人民解放

· 522 ·

军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战。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统一的,但从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上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惯制定的。当时各大战略区都有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全国政权建立后,已经不适应要求。于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自然地成为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1951年中央军委制定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设方针。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纪律性的“五统四性”。他还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①

在新的建军任务面前,是自己摸索,还是向外军学习,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按照哪一种模式建设军队,必然成为一种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排除外来经验。但是,西方国家的军队,是国家化的军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建军原则上,人民解放军不可能向西方军队学习。由此而来的管理教育、作风纪律、军事训练等,都无法与西方军队“接轨”。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最为迫切是,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来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是缴获和接收国民党军的各种装备。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途径已不可能。而新建立的军种和兵种,则从零开始,困难更多。如海军在接收国民党海军的一些破旧装备之后,为执行作战任务,一面抢修,一面改装从香港或国内各航运公司购买的商船、渔船。仅此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而国内自行研制生产又不具备条件。因此,向国外购买,就成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起初,通过香港向西方国家购买了一部分武器装备、材料。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这条渠道被堵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它的科学技术也是第一流的。但是,由于中美关系尚未解冻,人民解放军只有向苏联军队学习,并争取得到其帮助,才能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苏联军队是列宁亲手缔造,在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诞生,并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是打败世界

法西斯的主力军。它的建军经验及军事科学技术受到普遍重视。就武器装备来讲,苏联在战后大力开展尖端科学研究,于1949年8月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就军事科学理论来讲,苏联军队拥有的军事科学理论,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运用和检验的。因此,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人就考虑到人民解放军建设要学习苏军的问题。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苏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曾经给予过很多的援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中国人民所景仰,苏联军队建设的经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关注。1949年6月,毛泽东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②各行各业都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因此,学习苏军,实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选择。

至1952年底,中共中央鉴于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从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在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中,军用项目有44个,占总数的28%。即: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因此,人民解放军以苏联军队为模式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已是自然而然之事。

1952年12月15日至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在总结军队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军事训练、编制体制、政治文化教育等议题,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学习和借鉴苏军的问题。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在关于军训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不少干部对学习苏军还缺乏正确认识,因此有必要“号召全军向苏联学习,扫除学习中的各种障碍”。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总结报告中,阐述学习的意义,提出了今后学习苏军应该注意的问题。1953年1月1日,毛泽东指示:“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③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军队领导人为强调学习苏军的重要性,这时也说了许多过后看来过火的话。如1952年底,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在全军的师教导队长集训班讲:“在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学到手,即使当前用不上也不要紧;要坚持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等。”^④1953年春,张宗逊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军院校会议,中心议题是继续贯彻学习苏联军事院校的办学经验,继续贯彻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的要求。这些话对于克服当时的经验主义思想障碍,虽有一定积极意义,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事后严格推敲起来,不仅不全面,还引起了一些不良后果。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和平条件。但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研究和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确定要大力缩减军费开支,以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基础。彭德怀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研究修订军队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一方面精简军事系统的人员,缩减军费开支,以支援国家建设;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具体计划包括:减少国外订货,有重点地进行采购,各特种兵主要是在现有基础上抓培养干部和技术兵员。同时,改革一些重要的制度。从此,学习苏军进入全面照搬苏军经验的阶段,比如将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准备实行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勋章奖章制;总部的机构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外,陆续增设了武装力量监察部、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军械部、总财务部,形成八大部;明确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而这一中心工作的中心,又是培养干部等。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仅为加强军队的全面建设确立了一系列重大的方针原则,也进一步明确了学习苏军应具有的态度。会议强调指出:一方面要充分认识苏联军队是世界上最为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应当虚心学习其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作战经验、指挥艺术等,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的思想;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结合自己的特点和过去的作战经验去学,防止完全不问实际情况的机械搬运。从

1954年起,全军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原则,进一步加强了以调整编制、改革军事制度、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军事训练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学习苏军活动随之进入高潮。

二、学习苏军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苏联政府和苏联军队的帮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立健全总部领导机关开始,完善诸军种多兵种的合成军队建设,制订各种条令条例,改建和新建军事院校,改善武器装备,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军队建设的步伐大为加快。

1. 派人到苏联学习或考察

为造就出一大批适应现代化军队建设的干部,人民解放军陆续派出文化水平高、有实战经验、年轻的各级干部去苏联考察或入苏联军校学习。从新中国成立起,平均每年派出数百甚至上千名干部去苏联学习、考察。海军为使更多的干部有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在1952年前派出近300名干部到苏联驻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学习。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也纷纷考察了苏联军队的建设情况。这些考察开阔了领导人的视野,促进了部队教育训练。1954年12月初,国防部长彭德怀、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应邀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队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们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回国后,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

通过在苏联的考察和学习,许多干部提高了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认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苏联访问期间,特意请苏军专家介绍海空军的组成和使用、各种轻型舰艇的战斗与使用、登陆或反登陆作战的计划与组织、造船设计、舰艇的保送修理等,大开了眼界。

2. 聘请苏军顾问、专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和部分陆军兵种的创建,先有机关后有部队。如空军,确定刘亚楼任司令员时,飞机、航空学校很少,还没有组建部队。苏联不仅提供飞机、航空技术,还派专家到中国来指导,派教员到中国航校来上课。1949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偕王弼、吕黎平等入赴苏联商谈购买飞机事宜,议定聘请苏军专家顾问帮助中国开办航校问题。10月,通过协商达成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空学校,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工作。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建校方案。筹建航校的领导干部会同来华苏联专家、顾问,共同进行实地考察,很快选定校址,不久即开学上课。教员全由苏联专家担任。开始上航空理论课时,从苏联购买的教材还没有运来,专家们就自己动手编写提纲。讲课由翻译现场直译。由于直译效果差,各航校抽调大批航空技术人员和新参军的大学生担任助教。上课前,苏联专家、翻译、助教共同备课,课堂改由助教讲,专家与翻译到课堂听课指导。经过一个多月的航空理论学习,学员就掌握了必备的基础理论。1950年1月16日,第三航校首先开飞。至2月6日,其他航校也都陆续开飞。由于苏联教练人员和学员的艰苦努力,学员很快毕业并投入部队使用。

海军也是在苏联提供的舰艇、技术人员培训之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最早的一批苏联专家是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下旬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军学校帮助建校办学。同年11月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问苏联回国时又带回6人。海军从1950年8月提出3年建设规划,到中苏双方达成1953—1955年的具体订货实施计划,即向苏联购买5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和一些材料、设备,然后在国内装配,完成了组建工作的重要一步。此后,每年都聘请一批,多则几百人,少则几十人。至1960年,累计达3390人。

装甲兵、防空兵的发展,也大致与海军、空军的情况相同。

聘请苏军顾问、专家,开始并没有计划,而是根据需要随时同苏联方面商定。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请求聘请苏军顾问12名,其中5名是空军司令部所需的,另7名是为组建全国气象勤务服务所需。2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的订货单中所请苏

军顾问 205 名,其中 164 名是用来扩大航空学校使用的,41 名是用来组建空军陆战师使用的。这 205 名顾问曾经苏联军事部审查过,并认为是需要的。4 月 13 日,空军订货单提出聘请苏军顾问 43 名,是为 5 月间毕业的一批飞行员所编成 3 个空军团、1 个师指挥机构、3 个技术服务队所需要的,已与苏联驻中国总军事顾问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柯托夫商定。“估计到我军干部完全没有指挥空军的经验,因此,这批顾问实为需要。”^⑤

苏军在华顾问、专家,每年保持在 1 000 人左右,个别年份略高一些。他们主要分布在机关院校。以 1950 年为例,8 月份前已聘请苏军顾问、专家 1 000 人。8 月 22 日,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驻中国总军事顾问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柯托夫商定再增加 208 人,即:军委机关(包括海军、空军、陆军各兵种)50 人,6 个大军区机关 96 人,6 大军区军校 48 人,军事学院 14 人。苏联专家、顾问任期 1 一般为一年至 2 年,个别短则几个月,长达四五年。他们集中在空军、海军,总部及陆军部队相对少一些。如海军仅 1951 年,就增加顾问和专家 200 人。至 1960 年,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苏军顾问和专家全部撤离。

3. 订购武器装备

中国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开始并没有统一的计划,也是根据需要同苏联随时商谈。如 1950 年 2 月 11 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之信所附订货单内曾订购一批弹药,这是买来给六个航校作教练用的,当时曾估计到学校教育可利用我们在国内搜集的美式、日式炸弹,所以炸弹没有订购,炮弹则因口径不同,不能不买。现在各校已到射击教练时间,这批弹药仍未见发来,等得着急,因此应催其迅速发来,否则将耽误教育计划完成,影响作战”^⑥。3 月 8 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致苏联军事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信中所购炮弹 10 万发,是当时根据国民党军有意轰炸我各大城市,因此买准备各航校作战战斗防空用的。“最近送去的新订货单中所定之第一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定海战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金门战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台湾战役用的,因此并不重复。”^⑦“关于海岸炮,系与海军顾问商定的,请按周致布(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笔者注)信所附海军订货处理。”^⑧

后来,为加强计划性,中苏双方商定按阶段订、供货。现以中国向苏联提出的 1953—1955 年海军供货情况为例:

驱逐舰	12 艘
护航驱逐舰	18 艘
作教育用之小型潜艇	2 艘
大猎号	42 艘
小猎号	28 艘
扫雷艇	30 艘
远航鱼雷快艇	100 艘
装甲艇	66 艘
水鱼雷飞机	108 架
运输机	10 架
海岸炮兵(装备)	10 个团

其中,请求 1951 年内经火车运输供货的海军装备有:

远航鱼雷快艇	36 艘
装甲艇	36 艘
小猎号	18 艘
小型潜水艇	2 艘
小型扫雷艇	15 艘

中苏商定的中国海军 1953—1957 年五年发展计划,由苏军提供 3 年装备订货。

1955 年 5 月 24 日,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商,苏联向中国归还旅顺口的海军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有选择并有偿地接收了苏军 1 个潜艇基地、5 个歼击机师、1 个轰炸机师、2 个步兵师、1 个机械化师、3 个地面炮兵师、3 个高射炮兵师等部队的大部分武器装备。^⑨

到 1955 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苏军的帮助下,利用进口和国产仿制的武器装备,装备步兵、骑兵、航空兵、地面炮兵、高射炮兵、边防内卫部队、要地防空部队、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共 186 个师和海军 9 个舰艇支队。至此,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的装备迅速发展,步兵的旧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被淘汰,基本上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制式化。

4. 翻译出版条令条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没有统一的条令条例,各野战军有的自编,有的翻译外国的,有的借用国民党军队的。有的内容十分复杂,有的又过于简单。为尽快实现正规化,中央军委决定翻译借用苏军条令条例。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翻译出版了《苏军纪律条令》、《苏军内务条令》;1950年4月,翻译出版了《苏军步兵操典》、《苏军警备勤务条令》;1955年1月,翻译出版了《苏联军事刑法》。这些条令下发全军部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在试用中也出现苏军条令条例并不完全符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条令条例编审委员会,尽快编写出适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条令条例。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条令编审委员会在参照苏军条令条例的基础上,于1950年10月编写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

人民解放军颁布自编条令(草案)以后,部队仍难以适应。因为条令要求比较高,而人民解放军装备差、正规化程度低。于是,中央军委再次决定: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同时照顾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自行制订和使用的法规的传统习惯,修改三大条令。1951年1月,第一次修改的三大条令由总参谋部颁发部队使用。

1953年初,人民解放军实行正规化建设的条件进一步成熟,中央军委再次决定修改三大条令。中央军委强调:修改以改装师和新编制作基础,同时照顾正规化建设,着重以苏军条令作蓝本;条令的体系和各种规定,只要现在行得通,就采用苏军的,尤其是关于技术、战术及技术管理方面,更要如此。经过修改,1953年5月1日,由中央军委颁发了第二次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有自己的战斗条令。于是,各军区、各军兵种全面展开条令条例和教材的编写或修改工作,逐步由主要借用苏军的法规过渡到使用自己的军事法规。

5. 翻译出版苏军资料

由于刚刚结束革命战争,人民解放军在军事理论方面比较薄弱。

于是,为借鉴苏军的军事理论成果,这一时期创办了多种译丛和介绍苏军的刊物。1950年5月,创办了全面介绍苏军军事工作的《军事译文》丛刊、集中介绍苏军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译丛》、介绍苏军航空技术及战术的《苏联空军报摘译》等。

为满足教学和中、高级干部学习的需要,大量翻译了苏联军事科学著作。1950年,西北军区翻译出版了《苏联军队的政治教育》、《苏联军队中的文化教育》;1950年,第四野战军翻译出版了《苏联红军三十年》;1951年,空军训练部翻译出版了《苏联空军发展史》。此外,地方一些书店也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苏军的书籍:1950年,东北新华书店翻译出版了《苏军简史》;1956年,时代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苏联建军简史》。

6. 进行严格训练

严格的军事训练,是军队通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但是,对于游击习气较重的人民解放军来说,军事训练不仅经验不足,更重要的是思想上难以转变。为摆脱这种状况,根据正规训练以苏军为榜样、以干部训练为重点的方针,各军兵种、各军区都聘请苏军顾问进行指导,帮助制订训练计划,进行现场指导。

在部队训练中,强调培养严格执行部队各种条令的正规作风;抓提高部队的各种技术水平和掌握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能力,并着重抓合同战术的演习,着眼于提高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在干部训练中,按年度颁发在职干部的训练计划和大纲,规定各级各类干部在职训练的时间、内容、要求,以及检查考核的办法。这种在职训练带有普及性,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重点解决急需的知识和技能,使之和部队开展的正规训练相适应。

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全军在军事训练中进行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演习。1954年11月由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主持的抗登陆演习,1955年11月在辽东半岛由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叶剑英主持的抗登陆演习,都是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进行的全军性演习,影响很大。特别是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其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

队指挥员和部队。参加演习的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 6.8 万余人。1957 年,人民解放军参加了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共同组织的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学习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和方法。

在正规化军事训练中,开始由于照搬苏军经验,有些要求比较僵化,如起床、用餐、就寝等,要求统一动作,缺乏灵活性。后来,这些不适当的规定取消了。

三、学习苏军引起的争议

在学习苏军初期,有一些人认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够用了,何必学苏联的呢?”^⑩针对这种经验主义的模糊认识,当时从中央军委到部队,全面展开了学习苏军的宣传活动。中央军委机关刊物《八一杂志》多次发表评论,毛泽东也发出学习苏军的号召,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都撰文论述学习苏军的意义。中央军委召开有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联席会议,专门总结学苏军的经验教训,讨论有关的计划,朱德、彭德怀等人还亲自到会讲话。在这次会议后,学苏军的活动在全军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但是,在学苏军过程中,由于一度过分强调学习苏联建军经验,有的甚至将其绝对化,导致了教条主义的产生,出现了一些不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情况而生搬硬套苏联建军经验的问题。于是,中央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学习苏军经验要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防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习态度。并且及时组织全军部队、机关、院校着重检查和批判在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联系中国实际,在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基础上学习苏军的指导思想。训练总监部还就训练中如何学习苏军的问题专门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进行了为期 40 多天的讨论。这些措施,对纠正正在学苏军过程中产生的思想偏差起到了积极作用。只是受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后来没有坚持下去。

学习苏军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倾向,这本身就预示着总有一天要交锋。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

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终于点燃了导火索。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就此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这本来与学习苏军毫无关系,但是在善于从政治风向判断是非的年代,却使那些过去思想上反对学习苏军的人,认为反对盲目追求农业合作社发展数量,也适合于反对盲目学习苏军,所以他们以为找到了说话的机会。过去在学习苏军中随风倒的人,开始倒向反对这一活动。这样,过去主张学习苏军的人开始受到责难。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批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这一方面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信;另一方面也由于否定斯大林,引起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造成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思想混乱。而这时学习苏军的活动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于外国经验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①几天后,《人民日报》发表根据这次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6月,中共中央为纪念建党35周年,向全国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对照学习、检查教条主义。

于是,在军队高级干部之间及机关、院校中,围绕教育和训练工作中是否存在教条主义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和争论。接着,在全军范围内出现了究竟应该反对教条主义还是反对经验主义的议论。“在党内外的各种会议上,到处可以听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死搬硬套的批评和指责。说过去的训练方针不对头,学校教育搞错了,部队训练也搞错了;过去条令方针不对头,各种规定也搞错了。似乎过去的一切都搞错了,都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死搬硬套。言者振振有词,并且列举了历史上多少沉痛的经验教训。于是‘苏军的东西只能放在柜子里’、‘苏军有许多东西是落后的’、‘在军事学院学习成绩越好的,就中毒越深’、‘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朝鲜战争要是苏联打,就非打败不可’。种种说法不一而足。结果是造成了军事思想上的大混乱,特别是在北京。”在这一部分人看来,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不赞成学习苏军的人,总能找出一些现象来说明自己反对的理由。他们反映:学员睡觉时,脱了衣服要等着下口令才准躺下;为了内务三齐一平,信阳步兵学校有的学员要把被子剪短;步兵学校为了要学员一律剪成小平头,在理发室里贴上校长署名的关于剪发的命令,理发员还得用尺子量头发的高度。他们认为,“这都足以证明军事学校中形式主义在这几年来是严重的。”

在军队高级干部云集的军事学院,甚至有学员向中央军委反映:实行“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甚至认为“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像张宗逊那样积极主张学习苏军的领导干部,这时通过学习和思考,认识到“几年来我军的训练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未能强调很好地结合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选择地学习的态度。同时也认识到,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⑫。但是,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⑬

赞成学习苏军的人认为:“在数量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还有很多人没有学。然而我们已经开始批判了,已经有人反对继续学下去了,甚至认为再学下去是危险的!这究竟是由于苏军的东西果然不好或不完全好呢?还是由于我们没有学好,没有学会,没有学通呢?答复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只要稍微虚心一点,只要和群众有点联系,只要稍微调查一下,走走群众路线,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很明显,凡是学习过的,学习〔得〕比较好的都说好;凡是没有学习过或没有学通的都说不好。”

有人虽然承认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的、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人民解放军实际的内容,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人民解放军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战争急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

样,必然有一些副作用。但是总的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他们甚至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连训练方针甚至连建军方针都加以否定。

争论的焦点是学习苏军是维护还是损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因此,有必要了解当时对光荣传统的理解。1954年1月26日,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是什么呢?我们的光荣传统:在军事上就是毛主席著作中所阐明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的理论 and 实际,就是坚决、勇敢、顽强、机动、灵活;在生活作风上就是艰苦朴素、克服困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就是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就是发扬民主,打通思想,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就是军政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当时对“光荣传统”的最大争议是:在军队的领导权上,人民解放军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而苏军实行的是“一长制”。虽然都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人民解放军强调的是“集体领导”,而苏军则强调个人决断权力。现在来看,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实质的差别。

对学习苏军认识论的偏差,是引起争论的症结所在。正如当时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李达所说:“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片面性和极端主义情绪,很多方面都把缺点看得太多了,把优点看得太少了,个别地方还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其实,这只是认识方法问题。思想根源则是:领导和组织学习苏军的人担心,在学习苏军几年之后来否定其正确性,会否定几年来的工作成绩。^⑭

四、学习苏军活动的结局

1956年11月,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和总

高级步兵学校作调查研究。在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写出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报告。在肯定院校几年来学习借鉴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彭德怀看到这份报告后,感到有必要亲自去军事学院做进一步的调查了解,以正确解决军队教育和训练中出现的問題。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工作,同时到军事学院了解情况。毛泽东于2月25日表示“同意”,并批示:“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⑮

彭德怀一行到南京后,先后找机关领导、教授会主任、战役系的学员,以及副院长、副政治委员分别进行了交谈。院长刘伯承不在南京,没有交谈。经过调查和讨论,他们认为: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首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学术,并进行了传授,虽然不是介绍和学习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经学习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正由于对苏联军事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整理人民解放军的经验,编写条令、教范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再次,建立起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学院,该院开办初期干部少,现在已经比较多了,开始教学经验很缺乏,现在已经积累起来一些了,并且为海、空、炮、装等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准备了基础,这是经过全体同志艰苦经营缔造的结果。最后就是为部队、机关、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合成军队和技术兵种的作战指挥、组织训练、战术技术,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他们也认为: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中国的国情军情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人民解放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照顾得多,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得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人民解放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最近可能达到的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了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斗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人民解放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渗透、穿

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战争,人民解放军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行动作战,将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彭德怀认为:军事学院产生上述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办学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人民解放军的现成教材,因此不得不请苏联顾问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经验;战斗条令还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应当把责任归咎于学院,更不应当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的话,他自己是有责任的。

对于学院下一步的工作,彭德怀建议:应当以讲授学术和研究学术为中心任务;应当对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给予充分的重视;继续认真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应当贯彻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关于学习苏军问题,彭德怀强调:“应当明确,正确地学习苏军的经验不是教条主义。如果以为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反对学习苏军经验,或者认为强调发扬我军过去的有用经验,就可以不再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和其他外国的军事经验,那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学习苏军的经验和其他外国的经验,是为了依据我军的实际情况来更好地解决建军和将来作战问题,不是毫无目的的学习,不能为了学习就把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加以夸大。因此,应当坚决贯彻结合实际的学习方针。在这个方针下,就全军范围来说,应当以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合同战术为重点,并且应当从我军的现实情况出发。”

这个报告,对军事学院建院后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报告在肯定学院成绩时,并没有明确指出成绩是主要的,只是说“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因此,彭德怀向军事学院党委提出:“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①6}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在全党开展反右倾、反保守主义的大气候下,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工作中断,代之而进行的是开始批判教育训练中的经验主义。一些曾反对过教条主义、主张有选择

地学习苏军经验的人遭到批判。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检查、批判、肃清“保守思想影响”。训练总监部原副部长张宗逊、训练总监部院校部副部长孙毅、训练总监部院校部处长彭施鲁等人分别被点名批判。由于缺乏实事求是,带着情绪揭批,越批越离谱。开始给他们戴的帽子是“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后来竟然成了“修正主义”、“反苏”、“右派”。^⑩

但是,这种状况持续时间不长,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学习要和独创相结合,批判了过去8年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提醒大家注意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毛泽东还指出,军队的工作落后于地方,要求通过军委扩大会议以整风的方式来改变落后状态。全军在学习中,又回过头来检查和揭露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问题。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学习苏军被当作教条主义的恶果,成为军队批判教条主义的活靶子。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彭德怀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本来会议的任务是部署全军整风运动和研究军队整编问题,可是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参加或列席过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人,把训练总监部争论的问题提出来,从而使军事训练工作中该不该反对教条主义也变成了会议的一个主题。6月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他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如果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把会议参加者的范围扩大到师。6月20日,开全体会议,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列席代表438人。彭德怀在大会一开始就提出反对教条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6月23日至29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话的末尾,他对刘伯承做了不适当的评论。当组织会议的人向毛泽东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泽东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斗争、批判愈演愈烈,训练总监部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总司令部”,原军事学院是“资产阶级军

• 538 •

事路线的大本营”。大会先后点了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宋时轮、总参谋长粟裕、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叶剑英、前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⑮的名,并称他们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会议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中心议题,把一些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当作现实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共产党的军事路线的高度加以追究。

这时,虽然有人对这种一概而论的做法有意见,但是已经无法展开民主讨论了,赞成学习苏军的人成了斗争的靶子。训练总监部原条令处处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过中央军委批准下发的,话未说完,即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轰出会场,关押起来。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抱病出席会议,并作了检讨。叶剑英表态说,在训练总监部没有交好班。萧克、李达等人也分别违心地做了检讨。这样,使组织训练工作的干部都有一种灰溜溜的心情,极大地挫伤了工作积极性,影响了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打乱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最后,大会总结认为: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建军新阶段的初期,因为缺乏合成军队的建设经验,强调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正确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由于在学习态度和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没有破除迷信,在若干方面忽视了人民解放军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机械地搬用了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军情的外国经验,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在条令制度、组织编制、干部工作、后勤工作、兵役工作和国防筑城,甚至在政治工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过。在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中,尤其严重。但就在这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制度仍然坚持下来了。广大干部对这种倾向,也进行了抵制。1954年高级干部会议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基本上制止了它的发展,因而教条主义倾向才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但当时从思想上进行深入批判不够,直到1956年学习5个文件和中共“八大”文件,以及1957年整风运动,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才受到了比较深刻的批判。绝大多数人“思想解放了”,对于不适合实际情况的问题进行了检查,对于死搬硬套的学习方法进行了批判,搬错了的已经或者正在进行改正。“许

多由于思想上的盲目性犯过一些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大多数都觉悟过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也有一些同志,中教条主义的毒害较深,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够,应该继续进行彻底地检查和批判。”会议对当时学习苏军存在问题的估计是严重的,对于主张学习苏军的人批评也是严厉的。

会后,全军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由于过分强调自己而排斥外国有益的经验,使一些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被废止,反教条主义产生了严重偏差:(1)以为凡是学习理论,就有教条主义嫌疑,或就是教条主义。于是把现行教材中有若干与人民解放军不相适应的地方加以夸大,笼统地认为过去学的都和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甚至有人说“条令、教范就是教条”;还有的说,“学习苏联问题,我认为学的[得]越深,中的毒越深”,“现在学了是要打败仗的”。(2)把按规章制度办事,按操作规程训练,与死搬硬套和不民主混淆起来,甚至把不合自己口味的,都说是教条;把工作中产生的缺点,也当做教条。(3)把军队中应有的形式看是形式主义。如内务条令中许多正确的必要的规定——礼节、见首长的报告、消防规定、弹药仓库设置卫兵等,有些单位也当做形式主义取消了。(4)把学术上的争鸣和民主,与行政关系混淆起来。行政上许多规定、指示,有些单位在大鸣大放和讨论中就自动取消了。

反教条主义开创的恶劣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批判、被免职等处分。刘伯承免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萧克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任农垦部副部长;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职务,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责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大部分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转业处理。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条令处处长蔡铁根,红军干部,当时是正师职、大校军衔,因主张学习苏军被撤销处长职务,改任军事学院教授会主任。后来,又因坚持自己的观点、向中共中央进言而获罪,被赶出军队,到江苏省常州市工业局工作。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罪名是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1970年3月11日上午,被押往常州市西门外公墓执行枪决,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时年50岁。学习苏军,留下了血的教训。

侥幸过关的干部为部队建设刻苦工作的积极性遭到严重打击,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新中国刚刚起步的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经过反教条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向中央提意见被批判。紧接着,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指责彭德怀也“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只讲现代化、正规化,不讲革命化”,从而使学习苏军的活动彻底停止。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彻底平反。30年前的争论的阴影到此总算结束了。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④《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⑧《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⑨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⑩转引自彭德怀:《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八一杂志》第25期,1953年2月18日出版。

⑪《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⑫《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页。

⑬《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页。

⑭《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

⑮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⑩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

⑪《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52—453页。

⑫1957年7月，军事学院分为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两所学校，刘伯承不再担任学校领导职务。

⑬《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50—452页。